

A Handbook for Grammat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2nd edition)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

西方最新语言学理论译介丛书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第二版)

**A Handbook for Grammat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2nd edition)**

刘丹青 编著

问卷原作 伯纳德·科姆里

诺伐尔·史密斯

问卷翻译 刘丹青 吴可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 / 刘丹青编著. - 2版.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444-7312-5

I. ①语… II. ①刘… III. ①民族语-语法-调查研究-中国②汉语-语法-调查研究 IV. ①H14②H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2536号

责任编辑 芮东莉

封面设计 郭伟星 周 吉

西方最新语言学理论译介丛书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第二版)

刘丹青 编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官 网 www.seph.com.cn 易文网 www.ewen.co
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张 42.75 插页 2
版 次	2017年4月第2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7312-5/H·0261
定 价	118.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丛 书 序

每个时代的学术都有其自身的特色,语言学这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也不例外。中国的“现代语言学”一般认为是从《马氏文通》开始的,其实除了《马氏文通》,还有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在此之前,对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目的都是为了通经和规范。由西方引进的现代语法学和现代音韵学从观念上不再把这些研究看作是为读经和规范服务的,而是语言科学研究的一部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学东渐成为大潮,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语言文字学(俗称小学)也和其他许多人文学科一样走向现代化。印欧语的研究传统敲开了汉语研究的“封闭”大门,要求与中国传统“结合”,《马氏文通》和《中国音韵学研究》是这一结合最重要的标志。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最主要的表现是:眼光和观念的更新,理论和方法的改进。

把语言研究视为科学研究,就是要探究人类语言的规律,大而言之,包括语言结构的规律、语言演变的规律、语言使用的规律、语言习得的规律。因为终极目标是探究人类语言的规律,不是个别语言的规律,所以注重对语言共性的挖掘。北京大学的王洪君教授从美国进修音系学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其要点就是,原来中国传统语言学(小学)在音系理论的研究方面跟西方是并驾齐驱的,但是后来落后了,差距越拉越大,落后的原因就是只立足于汉语,忽视或自动放弃对语言共性的探索。共性在个性之中,又比个性层次高,忽视和放弃语言共性的研究使我们无法与西方人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也使我们无法真正了解汉语的个性。今天有许多汉语研究者同意要将汉语置于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来考察,这就是眼光和观念的更新。

高本汉比较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结合韵书韵图,运用印欧语研究中卓有成效的历史比较法来研究汉语古音,开创了汉语音韵研究的一个新时期。朱德熙先生继赵元任先生之后,运用结构主义的语法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从形式和分布入手来划分词类,开创了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影响了不止一代学人。这两个实例可以说明理

论和方法的改进。

回顾历史，一百年来包括马建忠在内的先觉先悟的知识分子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纷纷从西方借鉴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用鲁迅的自白就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一百年的时间倏忽而过，中国学人在新世纪到来之际面临这样一种处境，即：西方流行的一种理论还没有很好掌握，还没有来得及运用，人家已经换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了。中国老是在赶潮流，老是跟不上，中国学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这种处境呢？其实，科学的进步、学术的前进就是不同学术传统不断碰撞、交流和交融的结果。高本汉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得益于中国的语文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汉语音韵的研究中碰到了两次好运气：研究汉语中古音系的时候有《切韵》系统的韵书韵图，研究上古音系的时候有诗韵和汉字的谐声系列，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清代的学者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我们需要的是历史发展的眼光、科学进步的观念，加上宽广平和的心态，因为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一时的落后不等于永远落后，然而要摆脱落后，唯有先将别人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至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创新。这是历史给中国学人、给中国文化留下来的唯一的再生之路。

在世界范围内，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和变化是很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很多。正是本着这种学习加创新的宗旨，上海教育出版社组织推出这套《西方最新语言学理论译介》丛书，其作者大都是一些视野开阔，在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正活跃在我国语言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内容多数以介绍国外近年来出现的新理论新方法为主，同时也适当包含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希望这套丛书对新时期我国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一些促进作用。

沈家煊

2006年7月

序

1987年年底,著名的语言类型学家伯纳德·科姆里的著作《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由我译成汉语,出版前,科姆里为这个汉译本写了个序言,序言的最后一句话是:“衷心希望中国的语言研究者能得益于这个中文译本,从中意识到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从而能把汉语置于这个变异范围之内来考察。”一转眼已过去20年,欣慰的是,今天“把汉语置于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来考察”已经成为我国很多语言研究者的共识,甚至成为一个指导行动的口号。

每个国家的语言学家总是以自己国家的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语言学家的根本任务是揭示人类语言的本质。人类语言的本质既体现在语言的共性上,又体现在语言的个性上,语言的共性和个性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语言可以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变异有一定的范围,要受一定的约束,变异的范围和约束就是语言的共性。这就是语言类型学的基本主张。

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语言研究者在研究汉语时,由于缺乏一种世界眼光,最多也就是拿汉语跟少数几种常用外语作一比较,结果往往是把属于语言共性的东西看作是汉语的个性,而把汉语真正的个性给抹杀了。眼界是否开阔,这跟研究的目标是否远大有关。如果我们根本不想揭示人类语言的本质,为一般的语言学理论做出贡献,那当然就不必去关心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语言。这种状况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我国的语言研究者应该而且可以为揭示人类语言的本质做出应有的贡献;意识到我们的眼界必须打开,只关心自己母语的状态必须改变。

现在关心语言理论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已经认识到,没有一定的理论框架是观察不到语言事实的。但是对具体语言的描写仍然是提出理论假设的基础,这一点必须永远牢记。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他的研究对象始和终都是语言而不是语言理论,中间研究语言理论也还是为了研究好语言。

语言的描写离不开语言的实地调查,我们在语音调查上已经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在语法调查方面还刚刚起步。对我国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语法调查有很多不足之处,主要是缺乏一个好的调查框架,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却拿汉语普通话的语法框架来套其他方言和语言,那些方言和语言的一些重要语法现象反而没有调查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科姆里和史密斯编制的语法调查问卷正好能弥补我们的缺憾。

刘丹青君长期以来关注语言类型学的进展,对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语言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又有较好的理论意识,现在把它介绍过来,而且加上详细的注释,添加了大量的语言素材,重新编制为《语法调查研究手册》,这是久旱逢甘雨、雪中送炭,一定能大大改观我们语法调查的现状,使刚刚起步的大规模语法调查走上正轨。

关于这本手册的特点和功用,刘丹青君在卷首语和“引言说明”中已经有全面的说明,我就写上面这些话,祝贺手册的出版。相信随着我们语法调查工作的深入和改进,在调查者的共同参与下,手册也会作相应的修订,日趋完善。

沈家煊

2007年9月

卷 首 语

本手册以科姆里(Bernard Comrie)和史密斯(Norval Smith)所编制的《Lingua 版语言描写性研究问卷》(1977,刘丹青、吴可颖译)为提纲,对问卷的内容进行详尽的注释、例示、补充和分析,包括对不足之处或不适合中国语言之处的评述。总篇幅约相当于问卷的十倍。该问卷的翻译和出版得到了科姆里和史密斯两位教授的授权和鼓励。问卷的主体是语法项目,本书的说明也主要围绕语法项目,因而书名为《语法调查研究手册》。问卷后部也有简要的语音和词汇项目,本书只作简单的说明。

关于该问卷的宗旨、特色、使用方式等,原作者的“引言”已作了解释。关于该问卷出版的学术背景,以及在国内引进此问卷的意义,在“引言”后的说明部分也作了介绍。简而言之,问卷为各地人类语言的调查描写提供了一个尽量客观、全面和包容性强的语法框架,让调查研究者可以尽可能摆脱语种局限和学派成见,调查到尽可能多的语法事实。这正是主要习惯于汉语眼光的国内语法学界所非常需要的。

对问卷作详细说明、解释是基于三点原因:

一、本问卷的主体其实是一个供语法调查研究者参照的形态句法范畴框架,而不是可以直接拿来向发音人提问的问卷,它要求调查研究者熟悉其中的语法概念和专业术语。而该框架与国内主要用于普通话研究,也被方言、汉语史和民族语言语法研究所模仿的习用语法学框架相差很大,国内学界对该框架以及相关概念、术语比较生疏,难以直接借鉴参考。本书的说明为跨越这一沟壑搭建了一座桥梁。

二、问卷基于对亚、非、欧、美、澳众多语言的已有调查成果,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范畴视角,其中不乏国内学界尤其是汉语学界所不熟悉者。限于篇幅,大多数范畴问卷并未提供实例。因此本书在[说明]中采纳、引述、分析了很多相关的实例,涉及 10 来个语系,有汉语方言、国内民族语言和几大洲的外语共 200 多种,使读者对这些陌生范畴有更实在的感受。

三、问卷于 1977 年出版之后,语法学仍在快速地发展,国内的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语法研究也获得丰硕成果,对问卷中涉及的众多范畴,有些已有更新鲜的材料和更深入的认识,国内语言中也有更多的相关现象得到了调查和描写分析。本书的[说明]努力反映这些新的进展,并尽力沟通国内的调查研究成果和问卷中的范畴,使本问卷的内容更便于理解和使用。本书所参考的数百种中外文献绝大多数是问卷出版以后发表的,很多是 21 世纪的成果,这也部分反映了本书的这一努力。

本手册的用途是多方面的,详细的[说明]让本书至少能为下面这些领域服务:

1. 用作一本现代语法学读本,从中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现代语法学所涉及的广阔领域和众多语法学概念,为进一步的语法调查和研究打下基础。

2. 用作一本现代语法学专科词典,很多现代语法学概念可以从中找到解释,很多陌生的语法现象可以从中找到实例和分析,弥补一些语言学、语法学词典缺乏实例或引证限于英语等少数熟知语种的不足。普通语言学的学者可以从本书中找到讲课和研究所需要的大量语法现象的实例。

3. 为汉语(普通话)语法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课题。从手册中可见,即使是普通话语法,也还有很多领域尚待开掘,很多语法范畴的研究仍属空白。为难觅研究题目而苦恼的学人不难从中发现有价值、有潜力的研究新课题。书中介绍的范畴有些即使在汉语中没有显性表现,仍能为汉语的研究提供思路方面的启发,因为很多没有显性形态的范畴在汉语语法中实际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有定和无定、生命度、自主和非自主、新信息和旧信息等。

4. 为方言语法的调查和研究提供更具开放性、包容性的框架,便于突破现有普通话语法学框架的视野局限,将方言语法的研究直接置于人类语言多样性和共性背景之下,可以借此发掘出更多的方言事实并深化方言语法的研究。

5. 为汉语史提供众多新的视角,便于摆脱硬套现代汉语语法的局限,可以由此发现上古、中古和近代汉语中尚未开掘的众多新课题,或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老的课题,深化对汉语语法史的认识;也可以从其他语言的众多形态句法范畴中获得启发,发现汉语史中可能存在、但难

以凭今人语感直接获得的一些较为隐性的语法现象。

6. 本书对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作用可能更为直接,因为民族语言数量众多,语法上更具有多样性,套用汉语语法框架对民族语言研究造成的制约更加消极。借鉴问卷和[说明]所提供的更具开放性、包容性的语法框架,可以制订更加合理的调查方案,发掘出更多反映民族语言真正的语法特点和具有理论价值的材料。

7. 本书为语言、方言间的比较/对比研究提供了更加客观和开放的框架和多样化的语言材料,将比较纳入人类语言研究的更广阔背景,便于提升比较的理论层次,同时也为需要借助语法比较/对比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研究和机器翻译之类应用研究提供参考。

下面简要说明一下本书的体例和使用方法:

1. 科姆里和史密斯“问卷”译文作为本书的提纲以宋体排印,编号悉承原文;本书的说明作为“手册”主体用楷体排印,列在“问卷”各条目译文之下、带方括号的“[说明]”字样之后。少数条目未加[说明]。

2. 本书提供了较为详细的目录,从中可以查到问卷各层次专题条目和所涉术语的[说明],以便在阅读之外发挥手册的查检作用。

3. 手册所引的 200 多种语言、方言材料实例除作者本人熟悉的几种语言、方言外,均注明来源,可在书后“引用文献”中查检出处。

4. 使用拼音文字和国际音标记录的语言材料,本文都照录原文,只在两个方面作了统一处理:1) 辅音的送气符号统一使用辅音字母右上标的 h,如: t^h。不沿用原文可能采用的其他形式,如: th、t^ʰ。2) 亚洲语言的声调符号(大多为调值符号,壮侗语族和景颇语材料习用调类符号)统一使用音节右上标的数字,如: ta²⁴、ta²、ta²⁴⁻⁴²(短横前后分别代表本调和变调)。非洲语言的声调符号沿用原文的符号,如 á、ò 等。同一语言因作者不同而有拼写习惯不同的,照录原文。

5. 语言材料原有外文注译的,一律改为本手册所作的中文注译。

6. 本书对部分语言材料的分析与原描写者的观点不尽相同。

Lingua 版语言描写性研究问卷·引言

伯纳德·科姆里 诺伐尔·史密斯

随着对语言共性研究兴趣的日益增加,产生了用更大范围内的语言材料来检验语言学假说的一般性需求,而大多数已有的或正在产生中的语言描写,不管是对一种语言的整体还是对其一部分,所依据的都是现有语言学理论众多框架中的某一种框架,经常无法回答抱有其他不同理念的语言学家提出的问题,有鉴于此,很需要有一种可以就具体语言提供各种各样材料的纯描写性研究。

现在这一系列就是为了满足这个需求,它们提供语种或语群的从个别现象到总体状况的描写,其编排方式使有关语种或语群的信息便于为各种各样的语言学家所采用,从研究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学的学者,到研究比较句法学、形态学或音系学的学者。为了这一目标,对这一系列整体而言,有某个标准框架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语言学家只要熟悉这个总体框架,就很容易在本系列的特定卷本中找到所描述的有关某一语种的适当信息。就这个总体框架而言,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其适应性,它应该可以对任何语种进行充分的描写;二是要避免在这个总框架中建立一些未经验证的有关语言共性的预设,这样的共性是这套丛书旨在建立的,而不应是预先就设定的。最终的目标是一个可以用作催化剂的框架,由此导出的语言信息使上述各领域中以现代语言学任何理论为背景的理论研究都感兴趣。这个问卷体现了我们的尝试,就是构建一个满足这些需要的总体框架。

毋庸赘言,任何此类总体框架若要同时兼顾上面所述的易得性、灵活性和完整性诸方面,都只能是一种尝试,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设想我们得根据新的语料对支撑这个问卷的某些背景假设进行修正。因此,这个问卷应该被理解为语言描写的一个向导,而非一个束缚;在某些情况下,在回答本问卷的某个问题时,也许在得出满意回答之前就会面临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批评性讨论。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问卷问及一系列范畴时,我们的编号系统是开放的(各节中最后一个序号就

指同类总体情况下的其他例子),这样,那些被我们疏漏的范畴之类就可以很方便地随时加入,而不至于牵动整个问卷。遇到别的没有明确设立可添加处的情况,其他任何类型的材料都加在适当部分的末端,从该节最后的那个序号接着往下编号。不过,我们确实希望保持本系列的总体特性,那就是说,虽然展示语料与对语料进行理论处理二者之间也许从来不可能完全分离,但本系列的强调点就在于精确而有条有理地展示理论讨论所必须预先具备的材料。

本问卷的许多问题采用如下形式:在调查一种语言时,首先问该语言是否有所提出的某个范畴,如果有此范畴,下一步再问该语言怎样表达这个范畴。一般的情况是,即使某语言在形式上没有所提问的范畴,也可能找得到跟这个范畴作用相同的迂曲表达法。为使我们的工作不流于空泛,应明确这类迂曲表达不是我们所说的“范畴”之义。我们所说的范畴指的是在所调查的语言中可语法化的区别。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斯洛文尼亚语(Slovenian)中据报道有一个双数范畴,如 Kónja(两匹马),比较:Kónj(一匹马)、Kónji(多于两匹的马)。在英语中,虽然完全可以把 Kónja 译成 two horses,但并不存在一个双数范畴。斯洛文尼亚语 Kónja 和英语 two horses 之别,在于英语的 two horses 的意义完全可以由其组成成分的词汇意义和用于将这类成分组合起来的一般语法规则推导出来,而没有一个额外的双数范畴存在。斯洛文尼亚语的 Kónja 的意义则无法从这个词的组成成分推导出其为两匹马之义。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毛利语(Maori)语中存在一个专门的范畴,即第一人称复数的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如毛利语的 taatou(咱们,包括听话人“你”)、maatou(我们,不包括听话人“你”),而在英语中就无此对立,当然,这种区别在英语中同样有办法表示,只要特别说明一下“你”是包括在内还是排除在外就可以了,显然英语这种形式的意思也是由组成成分和它们所进入的结构推导出来的,而不像毛利语的 taatou/maatou 之别。

其他一些问题采用另一种不同的形式。这时我们所询问的不是有关语言是否存在某种所提出的范畴,而是该语言怎样表达某一特定概念,这里所指的概念总体上是表关系的,例如:工具语、主语、比较基准,等等。一般认为,在多数情况下,有关意义无法从表达这些概念的构成成分中推导出来;另一方面,即使情况确实如此,从比较句法学的观点来看,这些概念的表达方式也还是富有意义的。例如,假如我们取一个

被动句施事的概念,我们发现在英语中它由前置词“by”来表示,在苏格兰语中用前置词“wi”(with, 用)表示,在拉丁语中用“ab”(from, 从)加离格表示,在古希腊语中用“hypó”(under, 在……下)加领属格表示,在荷兰语中用“door”(through, 通过)表示。以上无一例外,人们都不能从有关介词的其他含义中直接推导出被动句施事这一概念。在这一方面,人们还可以比较马来语的差比表达式之一: Kayu, batu, bĕra tbatu(木头, 石头, 重石头。义为在木头和石头中, 石头是重的那种)。尽管没有一个显性的差比标记,但是该结构还是能很方便地被理解为一种差比句(不必隐含在绝对意义上石头重,而木头不重),而且这就是马来语中表差比的一种自然方式,不像那些可以想象到的其他意译。这样的例子也将包括在对本问卷的回答中。

另一些问题是涉及句子基本结构的一般性问题。这样的问题与所有语言有关,这是不言而喻的。

就第一种问题类型而言,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在一些语言中,某种给定的范畴是可选性的而非强制性的: 在斯洛文尼亚语中,双数范畴的运用是强制性的,如 Kónja 义为两匹马,而复数的 Kónji 义为多于两匹马。另一方面,在古希腊语中,双数范畴的运用是可选性的,换句话说,复数义为多于一。同样,在汉语(普通话、北京话)中一些名词的复数可以用一个词缀“们”来表示,但这也是可选性的,例如“朋友”(一个朋友/一些朋友)、“朋友们”(一些朋友)。

在回答本问卷中的种种有关是否存在某一范畴的问题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一个范畴的不存在和一个范畴的存在都要加以明确的说明。在许多描写中,仅凭某一个范畴未被提及这一事实,人们无从知道是相关语言中缺少这一范畴,还是作此描写的语言学家有意或无意地未提及这个范畴,或者这个语言学家其实还没能意识到它存在或不存在,甚或他根本没想去搞清楚这个范畴的存在与否。

既然这一系列成果的目的在于展示具体语种的信息,提供给那些对语言共性、语言类型比较和谱系比较感兴趣的语言学家使用,那么依本问卷所作描写的总路向就是从功能到形式。这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形式的诸种功能会分散在整个描写的各处,如拉丁语的宾格既出现于回答直接宾语的问题时,也出现于回答位移方向的问题时,等等。显然,这种描写必须辅以用某种方式从描写中找回某个具体形式的全部功能。这本身对从事语言共性研究的语言学家来说也富有价

值,例如,验证一种有关直接宾语和位移方向之间具有不限于特定语种的密切关系的假说,这种关系通常反映在两者形态上的等同性中。因此除了就本问卷所作的回答,或者在可能时融入对本问卷问题的回答(比如借助互参法)之外,还必须有一个形式索引——该索引在所调查的语言具有丰富形态时可以表现为词形变化表,以使读者同样可以由形式查到功能。

我们的意图并不是让本系列成果直接由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而构成。我们的意图是让此问卷为描写提供一个框架,而描写所强调的重点,正如上面已经隐含的,在于语言事实的展示而不是解释。另一个强调点是描写的充分性而非简短性。我们很希望有些语言现象在不止一个章节里被描写,而且只要有益就利用互参法来照应。我们已经举例说明过这种互参法何时是必要的。

不少问题都用含“程序(process)”一词的术语来表述。这并不意味着从事特定研究的人必须承认种种程序的存在,他应该认为这样提出问题纯粹出于方便的考虑。许多问题会看起来不言自明并且对某些人来说没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强调得还不够的是,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对其他研究者来说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问题中的每一点都应该在所调查的语言中找出大量例子来说明,并给例子释义。所描写的语言或方言如果使用的是拉丁字母或基于拉丁字母的转写系统,其各种项目通常应按该语言的正字法转写出来。当正字法无法表达某个事关音位的区别特征时,应当用附加等号加正字法的方式展示(如果该语言还没使用足以区别的附加符号的话),或者配以宽式音标转写法。在音系章节,所有的例子都应该用国际音标配上音位或语音的转写(以斜线或方括号标注)。在那些不特别关注语音细节的章节中,为打字的方便可以使用一个国际音标的改编系统(如以 š 代 ʃ ,或以 w 代 u),但是,任何有异于国际音标系统的地方,都应该与编辑事先清楚说明。

[引言说明]

引言本身相当于一个使用说明,其中作者已作了清晰说明的内容不必在此赘述,下面只对引言所涉及的语言学发展背景及由此带来的与调查目的和问卷用途相关的内容作一点补充说明。

20世纪70年代,是现代语言学各大流派崭露头角、各领风骚的年

代。现代语言学不同流派的特点是追求人类语言的共性。而对于注重“以事实说话”的语言类型学家来说,缺乏大量语言材料的共性是底气不足的共性。人们只有对更多语言的实际情况有真切的了解,才能更有把握地说出哪些是人类语言的共性,哪些是一种语言或一类语言的特点,也才能验证不同语言学流派声称的普遍语法理论哪些是经得起语言实际检验的,哪些是很容易被语言事实证伪的。因此语言类型学家们不但重视跨语言的比较,而且注重调查描写更多的人类语言,拓宽人们对语言真实状况了解的视野,发现真正的语言共性,也纠正某些以偏概全的所谓“普遍理论”。为此,欧洲的语言学刊物 *Lingua* (拉丁语“语言”之义) 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倡导世界上各种语言的描写性研究,并由富有调查研究众多语言经验的 Comrie 和 Smith 两位语言学家编制这本调查问卷在 *Lingua* 杂志 44 卷(1977 年)第 1 期 1—72 页上发表,以便为这类调查描写提供一个广泛适用的框架,期待由此吸引众多相关成果在刊物上陆续发表,从而形成一个描写性成果的系列。不过后来 *Lingua* 杂志实际上并未发表多少纯描写性报告,但这一问卷对世界上语言、方言的调查描写工作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欧洲的另一家出版机构 LinCom 倒出版了大量全球各地语言、方言的描写性著作,虽然详略不等,但很多著作所用的语法框架都接近 *Lingua* 版问卷,只是由于规模所限难以穷尽问卷中的所有调查项目。这些著作不但提供最重要的语法信息,而且虽有语种差异,但仍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语言事实特别是语法事实的调查,都是在一定的语言学理论指导下、在一定的语法体系框架内进行的。完全脱离语法理论是不可能获得语法事实的。没有受过语言学训练的人,哪怕是其他方面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如作家、诗人、科学家、工程师等,也无法对一种语言(哪怕是母语)作出令人满意的语法描写。中国古代有发达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但是没有系统的语法学,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调查和描写。这些情况都说明语法调查需要一定的理论体系指导。但是,理论体系的作用对于调查世界上众多不同语言来说也不全是正面的。问卷作者的这篇序言想着重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设法进行客观的、尽可能模型中性(model-neutral)的语言调查和描写。

现代语言学发展很快,很多流派都对语法有不同的假设。这些研究语法理论的学者往往比较重视语言中跟自己的理论假设有关或有利

于自己理论的内容,看待语言事实也容易带上自己理论特有的视角和眼光。这种目光对语法理论的研究来说可能是很必要的,但对于语言事实的调查和描写来说却容易导致主观成见,使人忽视跟自己理论无关或对自己理论不利的语言事实。因此,Comrie等主张语言调查提纲所依据的语法学框架应当避免过重的理论模型色彩。他们提醒大家,有关语言共性的认识应当是通过这类调查获得大量语言事实后得出的,而不是调查之前就预先设定的。只有暂时抛开理论模型的学派之见,才能使调查结果成为不同理论模型都能使用的材料。

另一方面,语言学理论的最新发展也不应当被忽视。只要分寸掌握得当,语法理论能对语言调查起积极的作用。较为成功的语言理论,往往都能为观察语言现象提供他人所不注意的新角度。调查提纲不一定要采纳新理论的有关结论,但是可以采纳新理论提出的观察角度。把不同流派的不同新角度汇总起来,就能得到更加全面的观察角度。据此订出的调查问卷表就能更加全面深入地发现语言规律。事实上Comrie & Smith的问卷就采纳了很多新理论模型的研究成果。正是靠这些理论的成功引进,才使这份问卷可以比以往的语法调查表更加全面深入地挖掘语言、方言中的事实和规律。例如,1.6.2—1.6.3关于反身代词的调查项目,就引进了当时刚刚引起句法学界重视的反身测试法,后来由生成语法提出的管辖与约束理论(GB,“管约论”)就非常倚重反身代词同指关系的测试(参看下文相关问卷项的说明)。Comrie等显然敏锐地注意到了反身代词同指关系测试的重要性,所以在问卷中就此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以前的语法调查表是不会从这些角度提出这么多问题的,也就无从反映语言在这些方面的表现。而这些角度的问题只是帮助调查者找出有关语言的实际规律,并不要求他们一定要附和生成语法或某个其他学派的现成结论。再如,Keenan和Comrie(1977)提供了有关关系从句的类型学研究成果,得出了决定关系化能否实现的著名的“可及性等级序列”。问卷表中涉及关系从句的调查项就引进了这项研究的观察角度。

当然这份问卷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不仅在于编制者引进了现代语言学大量新的观察角度,而且在于它建立在类型学家已经进行的大量跨语言调查和比较研究的雄厚基础上。从事语法理论探索的学者们,确实有人只在自己熟悉的语言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设,因此有时确有国内学者批评的“印欧语眼光”的问题。但是类型学家则向来注重观察更

多的语言,有些专题研究涉及的语种材料多达数百种。靠了这种“见多识广”,像 Comrie 那样的类型学家往往比一般学者更多地了解语言有可能在哪些方面语法手段、语法形式、语法范畴出现。以这样的眼光来调查语言、研究语法所得到的成果,人们绝无理由再用“印欧语眼光”一类成见去看待。而且,当代语言类型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不同流派语言学家的关注,当代形式、功能各种学派的理论模型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或引入类型学的跨语言视角,用这些理论研究过的分布在各大洲的语言至少也有数十种之多。到今天再来简单地指责国际语言学理论成果建立在印欧语或英语基础上,很可能是因为对当代语言学所知太少或干脆出自偏见。

比较起来,国内目前通行的汉语语法体系,尤其是体现在教学语法和多数方言、民族语言描写中的语法框架,较难用作语言、方言调查所需的理想的理论框架。首先,这类框架的很多要素还停留在结构主义时代对汉语的认识上,有些甚至是比结构主义还要“古老”的传统语法的观念,例如六大成分的观念。即使是汉语语法研究本身,也需要大力更新观念,引进新的研究视角。现有的框架体系难以承担起语法调查研究的理论框架之责。其次,更严重的是,国内的汉语语法学理论的主流较少像世界上的现代语言学各派理论那样有类型学的视野,而主要关注现代汉语普通话的研究,不太关心方言,尤其不关心汉藏语系的亲属语言和中国境内的其他民族语言(近年有所改进),更很少跟世界上的大量语言作比较(现有的一些语法学体系也不太具备跟其他语言的可比性),少量的比较多限于简单的英汉比较。因此,其理论成果的语种适应性相当狭窄,有时在汉语方言中就难以充分运用,用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研究更出现很多生搬硬套的情况。由此建立的语法学说也很难与世界对话,因此,用这种视野偏窄的理论体系作参照,难以全面深入地挖掘语言、方言中大量有意义、有理论价值的语法现象。所以,我们急需用本问卷这样的新角度来重新审视语言中的语法现象,包括我们自认为已经研究得相当深入的汉语。事实上,只要一拿这套问卷去考察,就可以发现,即使在汉语普通话中,我们还对那么多语法现象严重缺乏了解。例如,几年之前,内地的汉语语法学还很少系统研究汉语关系化的现象和规律,而关系化是人类语言一种基本的语法机制。至于中国境内大量的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更是急需我们用较为通用和先进的语法框架去调查描写,有些还需要作抢救性调查。假如仍然